

研究歷史不僅僅在於對人類的愚蠢和罪惡給以警示，也是要鼓勵人類銘記有價值的先人。過去不再是一個恐怖陳列室，而是變成一座英靈的城市，一個廣闊的思想國度。

——威爾·杜蘭特、阿里爾·杜蘭特
《歷史的教訓》

任何事情直到它們被記錄下來才算是真正地發生過。

——弗吉尼亞·伍爾芙

導言

據《澳門編年史》編者稱，澳門正式有文字記載的歷史不到五百年。然而，澳門考古出土的新石器時期的彩陶殘片和玉器顯示，早在葡萄牙人到來之前的四五千年，此地已有中國先民的足跡。南宋末年，澳門附近曾經有過宋、元兩軍的對壘，戰後有軍民隱居於澳門一帶，從此澳門逐漸有華人定居。自 16 世紀 50 年代起，葡萄牙人利用澳門大力發展遠東貿易，並在溝通亞、歐、美三洲的貿易中獲取巨額利潤而使澳門名重一時。明代著名戲劇家湯顯祖有《香畹逢賈胡》一詩：

不住田園不樹桑，玳珂衣錦下雲檣。

明珠海上傳星氣，白玉河邊看月光。

澳門隸屬南宋時設立的香山縣，故又稱香山畹，即詩中的香畹。賈胡，指的是當時在澳門的外國商人。據考，湯顯祖約在 1591 年間路過澳門，應是中國文人雅士為澳門作詩的第一人。當時澳門作為世界著名的港口和東方貿易中心的繁華盛景，由此詩也可見一斑。

相對澳門歷史上曾經輝煌過的航運商業和至今興盛的博彩業，澳門的教育事業在很多人眼裏是乏善可陳的，因為澳葡政府長期以來只是把澳門作為一個賺取巨額利潤的通商口岸，採取“惟取不建”的方針，既不建設澳門，更不關心澳門的公共教育事業。不過，當我們認真梳理澳門過往數百年的史料時，便會發現塵封於其中的澳門教育文化遺產的明珠，依然熠熠生輝。

當時間來到 19 世紀末，中國最後一個封建王朝已經搖搖欲墜，政壇上的改革浪潮一浪高過一浪，延續了一千多年的科舉制度也即將被廢除，而此時澳門的公共教育狀況則被媒體抨擊為：“很不理想，沒有一所令人滿意的學校。”不過，澳門教育在那個風雲變幻的大時代中也迎來了新的機遇。

1895 年，無論對中國政治還是澳門教育，都是具有深遠意義的一年。這一年，興中會策劃的廣州起義（又稱乙未廣州之役）失敗了，中國民主革命進入了低潮，孫中山逃離廣州，經澳門、香港遠赴日本，再次集結各方革命力量，為組織中國同盟會和最終推翻封建統治做準備。這一年，以及隨後的數年間，不少銳意革新、支持孫中山革命活動的有識之士，因政治避難而踏足澳門，這給澳門教育注入了新的活力，打開了新的局面，廖德山先生便是其中的一員。作為孫中山的同窗好友及興中會同志的廖德山，就是在 1895 年，為逃避清



廖德山肖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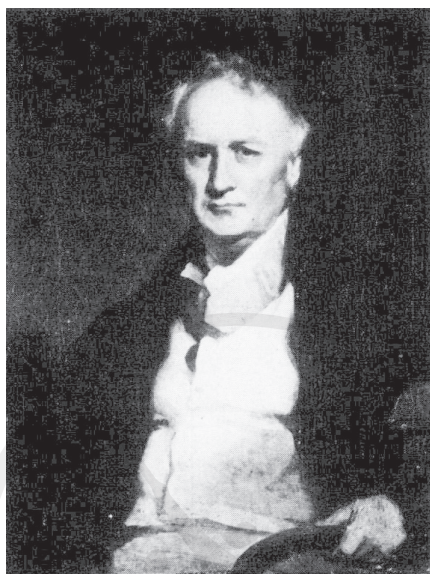
廷追緝，攜家人遠遁澳門，從此結下廖家與澳門教育長達大半個世紀的深厚淵源。廖氏一門先後有 10 位家庭成員直接或間接對澳門的教育事業做出過貢獻，他們的功績也成為澳門教育文化遺產的一部分，對今天澳門社會的發展依然有著深遠的影響。



澳門教育 往事鉤沉



曾於 1798 年作為瑞典東印度公司僱員來廣州，後成為瑞行大班而經年來往於廣州和澳門兩地，直至 1835 年在澳門過世的龍思泰（Anders Ljungstedt），在 1832 年發表了被國際史學界公認為第一部澳門歷史研究的權威西文著作《早期澳門史》。他在書中明確指出：“儘管葡萄牙人佔有澳門幾乎達三個世紀之久，他們從未獲得澳門的主權。”事實上，自 1572 年（明隆慶六年）起，葡人此前為居住澳門而繳給海道（主管沿海地區海防事務，兼及外貿和外交的文官）的賄金變成正式納入明廷國庫的地租。這種由賄金向正式繳納地租的轉化，說明葡人寓居澳門已經獲得明政府的認可，但同時也說明“他們從未獲得澳門的主權”。同年，明政府還增設了廣州府南頭、廣海海防同知一員，旨在加強



《早期澳門史》作家龍思泰畫像

對澳門事務，包括對蕃舶、蕃人及澳門稅務的管理。清政府於 1744 年（乾隆九年）正式設廣州府澳門海防軍民同知（簡稱澳門同知）。由此可見明清政府對澳門所行使的主權。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系統介紹澳門地理、歷史和物事的專著《澳門記略》，就是第一任澳門同知印光任在任內撰寫，並最終與繼任澳門同知張汝霖共同編著，於 1751 年完成的，比龍思泰的《早期澳門史》早了 81 年。

長期以來，澳門實行的是一種中國主權、葡國管治

的政治體制。澳葡政府（即便是在 1849 年強佔澳門之後）只是把澳門作為獲取暴利的通商口岸，長期以來對澳門的公共教育事業毫不關注，對由教會或民間主導的澳門教育持一種放任自流的消極態度。因此，澳門教育一直以來呈現一種中西方兩大教育源流井水不犯河水的狀態——中西並舉，華人和葡人的教育各自遵循自身母體教育傳統而平行發展。

澳門中式教育的沿襲

中國的教育傳統源遠流長，萌芽於五帝時代（約前 2700 年），至商朝已有比較完備的學校。西周集前代之大成，學校系統進一步完備，兼有國學（由天子或諸侯設立的大學、小學）和鄉學，具有養士（培育各級官吏）和教化（化民成俗）的雙重職能。兩漢時代，除了中央官學（太學），地方官學也舉國風行。春秋戰國私學的遺風在兩漢時期也得到恢復和發展，形成了很大的規模，其中也包括負責蒙學教育的書館。不過，對中國的教育模式產生重大深刻影響的，當數科舉制度。通過逐級考試、以考試成績來選拔人才的科舉制度產生於隋，發展於唐，經過宋、元、明的演變，完備和定型，直到清末 1905 年被廢除，歷 1300 多年，是中國史上歷時最長，影響範圍最廣的選士制度。這種打破世家大族對仕

途的壟斷的科舉制度，極大地刺激了中國教育的全面發展，官學、鄉學、書院、私塾等如雨後春筍，遍佈中國大地，甚至邊遠地區。自元代起，又興起社學——一種由政府倡導、以民間子弟為教育對象的初等教育形式。明清兩代，社學遍佈於廣大民間，特別是江南、東南沿海地區。清統一台灣後，社學的設置也逐漸遍佈全台（包括原住民地區）。明清兩朝還大力強化宗族制，各地祠堂林立，而大部分的祠堂還附設家塾，以教育家族後進。中國這種由上而下推行教育的傳統，延續了幾千年。

對澳門教育歷史做過專門研究的資深學者劉羨冰稱，曾在澳門出現過的學塾、書屋、社學，與中國內地的教育傳統一脈相承。其中有普濟禪院附近的“黃東暘書屋”和沙梨頭土地廟的“更館社學”遺址為證。據《澳門編年史》記載，1759年魏綰出任澳門海防同知，他尊儒重道，勸令包括澳門在內的恭常都十三鄉人士建鳳山社學——澳門第一個有記錄的公共華人學社。澳門望廈村趙元輅、趙允菁父子分別於1777年和1801年中舉，“父子登科”成為澳門流傳至今的佳話。據史料顯示，趙允菁中舉後以教育為業，先在澳門辦學塾，後任香山縣鳳山書院主講及始興縣文昭書院山長。1828年，兩廣總督李鴻賓任趙允菁為越華書院院監。1833年，授翰林院典簿，趙允菁成為早年絕無僅有的

享譽嶺南的澳門教育家。由此可見，澳門興學絕非短日之功，除應識文斷字和化民成俗之需外，也應科舉考取功名。事實上，自清初起，即便是漂泊在海上的澳門漁民，有經濟能力者也會延請塾師隨船出海（獨戶或多戶合聘），早晚在海上授課。但是，直至 20 世紀 80 年代末，漁民仍是澳門文化教育程度最低的社會階層，30 歲以上的漁民文盲仍佔 70%。事實上，其他澳門華人草根階層的子弟能夠接受社學、學塾教育的機會也是有限的。

澳門西式教育的發端

16 世紀中葉，隨著葡萄牙商船的到來，西方傳教士也踏上了澳門。最早來澳門傳教的是由西班牙人於 1493 年創立的天主教耶穌會。1571 年耶穌會創辦了澳門第一所初級學校——聖保祿公學（又稱“聖母學校”“兒童學校”），由此開啟了澳門的西式教育，從而使澳門教育呈現出中西教育並舉、平行發展的格局。值得一提的是，聖保祿初級學校的創辦也開啟了教會在中國興辦教育的歷史，它是天主教會在華創辦的第一所西式學堂，比一般史書上稱之為“最早在中國開辦的教會學校”——建於 1839 年的馬禮遜學堂，早了 268 年。據記載，聖保祿公學的學生眾多，每年平均二百餘人，

有葡人子弟，也有華人子弟。學校教讀書、寫字、算術和拉丁文，後又增加了音樂和文法。1580年，學校建立了一個傳教實習所——利瑪竇稱之為“經言學校”，供來華的歐洲傳教士學習漢語和練習用中文宣教，此為明代中國第一所供西人學漢語的學校。早期來華的傳教士羅明堅、利瑪竇等人都是先到澳門，在此學習漢語和中國文化禮儀，再赴內地傳教。這些早期進入內地的傳教士還包括第一位中國籍耶穌會神父鄭馬諾。澳門出生的鄭瑪諾十二歲時（1645年）遠赴羅馬深造（有史記載的中國留學歐洲第一人），1667年結束神學學習，被授予司鐸神職，成為第一位中國籍耶穌會神父。1668年鄭回到澳門，也先在聖保祿學院溫習中文之後才於1671年入內地傳教。

為培養向遠東各地傳教的神職人員，耶穌會於1594年在初級學校和經言學校合併的基礎上建立了澳門聖保祿學院，成為中國乃至遠東地區最早成立的一所西式高等學府，比日本的東京大學（1877年）、中國最早的京師同文館（1862年）和上海聖約翰大學（1879年）都要早兩百多年。聖保祿學院在其發展過程中逐步開設多種課程，包括語言（含漢語、日語、拉丁語）、哲學、神學、科學、天文、藝術等。聖保祿學院於1596年開辦第一個藝術課程，這對於西方美術在中國的早期傳播功不可沒。現存於羅馬的利瑪竇遺像被公認



澳門聖保祿學院遺址